

破解垃圾围村

观察(下)



定安次滩村村民自觉将垃圾倒进垃圾桶。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保亭排寮村村民将垃圾倒入路口垃圾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文昌南海村村道上设有专门的垃圾回收箱。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洁净坎头

昌江七叉镇坎头村，村头村尾每隔几十米就放置一个大垃圾桶，村民自觉把家里的垃圾收集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垃圾桶，保洁员推着推车，在村道上来回巡逻。

“镇里发了20个垃圾桶，不够用，就从集体经济中拿出一笔钱，自己购买了20个垃圾桶，这样基本上十几户人家就能共用一个垃圾桶。”坎头村党支部书记记林德全说，镇的垃圾转运车每天来一次，村里垃圾基本上不落地不过夜。

脏乱莪阳

儋州王五镇的莪阳村，在村口路边的草丛里，一堆醒目的垃圾占地几十平方米，各种颜色的废旧塑料袋、破损玻璃瓶零乱地堆放着。走进村门，左侧的一片洼地也散落着各种陈旧垃圾。一位保洁员在村道上清扫，路面虽然看不到垃圾，但路旁草丛里散落着塑料袋、包装盒等。

在莪阳村，记者没有看到一个垃圾桶。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镇里说要配备垃圾桶，但一直没有到位，村民家中的生活垃圾还是往村口扔。

长流中型垃圾转运站项目及万宁、临高市县转运站项目，要督导市县创造条件解决征地拆迁等问题，加快做好前期工作；对仍处于前期阶段的琼海、文昌两市配套填埋场项目要抓紧启动前期工作，加速推进。对部分久拖不决的项目和市县适时建议省政府启动问责工作机制，动真碰硬，对市县和项目责任人实行调离工作岗位、黄牌警告、通报批评以及诫勉谈话等处理。”

上面这段话，摘自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刚完成的《海南省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紧迫感。

陈永富告诉记者，目前，海南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刚起步。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到明年底，全省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必须基本建成，因此，项目进展缓慢的市县必须有紧迫感，要千方百计加快项目推进，否则，垃圾围村就有可能死灰复燃。

二 收转模式须科学

复制城市难持续  
完全自治一阵风  
服务外包价偏高

有了垃圾处理与收运设施，更重要的还要有一套科学的日常收集转运处理垃圾的机制。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了“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农村垃圾一体化处理思路，但如何具体实施，各地模式不尽相同。

政府包揽

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人口2000多。走进村庄，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垃圾桶，村民走出家门几米就可把垃圾扔到桶里，村中道路干干净净，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也都看不到垃圾。“村里有4个人专门负责搞卫生，当然会做得比较好。”一位村民说，村里搞卫生的都是政府花钱请的，每人每月1000元，这还不算，夏天还有高温补贴。东方市村镇保洁员和开转运垃圾车的司机共1100多人，像城市环卫工人一样负责全市村镇垃圾收集转运。

点评：年均费用超百元

目前，以东方、昌江为代表，主要推行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政府出钱购买设备，给保洁员和垃圾车司机发工资，政府又负责管理考核，基本上是复制城市环卫模式。

这种模式操作简单，效果明显。缺点是成本高。如东方市村镇保洁员1100多人，人员工资福利每年需2000多万元，村镇环卫设备运行维护费800多万元，如果再加垃圾处理费用，每年财政支出达3000万元。而东方市村镇人口不足30万，照此计算，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费用人均超过100元。

据测算，如果我省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照搬城市模式，每年需要投入12亿元。

村民自治

临高县东英镇西北村103户，480人。日前，记者走进村庄。碎石铺的村道干干净净，村民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小塑料桶，里面装有塑料袋、旧电池、一次性餐具等垃圾。在靠路边的一面墙上，贴着村民缴垃圾费的榜单，有3元的、5元的。在村口的垃圾池旁，一位老人正在弯腰把塑料袋、玻璃瓶等分拣出来，他把不易烧的垃圾分拣出来后，剩下的垃圾三五天焚烧一次，等堆到几百斤，就卖给种植大户作土肥，每月能卖两三百元。

“2月份镇上帮村里清除几个大垃圾堆后，卫生一直保持得不错。”西北村支书张学斌介绍，根据人口多少，每户收取3元至5元不等的费用，村民都意识到垃圾与自己有关，很少有人再乱扔。那些不易焚烧的垃圾

过去5年，全岛动员，全省农村开展了一场垃圾歼灭战，初步清除积存几十年的垃圾。然而，对于建设“美丽海南、清洁乡村”工程，这只是第一步。要根除垃圾围村现象，还必须建立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理的科学长效机制。

农村垃圾如何解围？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邵长春



我省部分农村村道铺满垃圾。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他山之石·国外农村垃圾处理

日本：各种垃圾分类回收

在日本，垃圾分类非常清楚，能回收的垃圾与生活垃圾分开投放，各放其箱。

在有些地方每周回收不同的垃圾，包括玻璃制品、不燃物质(塑料、橡胶、皮革等)、金属、家电等。这样的好处是，垃圾车装运同一种垃圾，可直接送到处理厂去处理，省工、省时。

日本运送垃圾的垃圾车全部是自动封闭式、自动加压式的，装车的垃圾可以自动压实，易拉罐之类的废弃物可以压扁成片。

德国：“环境警察”登门造访

“环境警察”登门造访，抽查居民是否把垃圾放到指定的桶里。如果分拣垃圾不当，把垃圾归错了类，放错了桶，他们会及时指出，严重的还会被罚款。

德国还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目前在欧洲22个国家通行。

欧盟：乱倒垃圾是犯罪

在欧盟的一些村庄里，张贴着“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而同样，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垃圾收集的服务或不按分区规划管理新住宅的开发，也将受到农村社区居民的起诉。

欧盟所有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都由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垃圾箱和垃圾收集处理的费用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房地产税及其他税收支付。

农民家中一般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一个装有机垃圾，另一个装无机垃圾。收取垃圾时，工作人员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则对垃圾进行分类，或把不适当的东西放到垃圾里，将会拒绝收集这些垃圾箱甚至罚款。

三 垃圾分类有优势

农村易腐垃圾近半就地堆肥用于种植  
部分垃圾也可卖钱

万宁长丰镇文通村，46户人家，小村干净整洁，绿树绕村。记者随机敲开了村民李蔚明家门，屋内很干净，11个装鞭炮的扁纸箱，整齐地堆在一起，一些啤酒瓶拢在一堆。她告诉记者：“纸箱是可回收的垃圾，可拿去卖钱。”庭院的一角烧过一堆树叶，树叶是有机垃圾，可做肥料。房屋后面20米处，有一个垃圾桶。“垃圾用塑料袋包好，扔到垃圾桶，过三四天有人来运。”李蔚明说。

“虽然是个别现象，但这说明，垃圾分类在农村是可以先试的。”陈永富说，塑料袋、酒瓶、废电池等难以降解、有害的垃圾可以运到垃圾处理场，而那些农村生产的植物性垃圾，如剩菜剩饭、枯枝落叶等完全可以就地消化，变成有机肥。

垃圾分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解决农村垃圾数量增长过快问题。近几年全省多地新建的垃圾填埋场有很快被填满之忧。

如昌江拿出140多亩土地，计划分两期建一个大型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场，首期2010年建成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能力100吨，但现在每天需处理的垃圾达到120吨，原计划服务7年的处理场将提前填满。现在，昌江改变规划，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二期停建，改建一个现代化垃圾焚烧厂。

陈永富说，农村生活垃圾易腐的占40%以上，通过人工分拣，可减少50%左右的垃圾处置量。

从现实情况看，垃圾分类从农村开始做起更有优势，做好了可以给城市示范。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房子空间大，能够为垃圾分类提供空间；在生活和工作节奏上，农村生活节奏慢，村民有时间做垃圾分类；另外，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之间具有互相监督的功能。

分类试点项目不了了之

垃圾分类从农村做起，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符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2008年，省环境科学院研究员张静在琼海龙江镇中洞村做了一个“农业固态废物综合处置示范项目”，主要目的是探讨农村垃圾分类、堆肥处理的效果。经过几年实践，垃圾减量率达到50%左右，无害化率达到100%，回收的堆肥质量符合现行标准要求，具有技术可行性。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示范点运行几年就放弃了。该村委会一负责人说：“财政不支持，单靠村民自己交钱，一年每户要交60多元，群众有意见。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说不定就坚持下来了。”

政府应花钱刺激村民分类垃圾

我省垃圾处理很早就提出“户分类”，但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去年，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在全省11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由于村民基本未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一些多年形成的卫生习惯无法有效改变，虽然配套了分类垃圾箱，但形同虚设，难以实现垃圾源头分类。

“如果换一种思路，通过经济刺激手段进行推广，可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陈永富说，比如设垃圾超市，具体做法是针对塑料袋、玻璃瓶、废电池等回收成本高、利用价值小或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政府以补贴的形式引导企业在集镇设立回收点，引导农民分类收集这类垃圾。企业回收后，有再利用价值的就回收利用，没有再利用价值的送到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进行处理。

四 体制机制需长效

向城市管理看齐  
整治不搞突击式  
机构经费常态化

近年来，我省农村垃圾整治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虽然已经投入几十亿元建设基础设施，但是，全省至今没有常态化的机构，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机制，整个工作仍然处在突击式、运动战状态。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在各级政府里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没有专门经费，一切都是临时性的。”陈永富说，“像我这个城市建设处处长现在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就显得不伦不类。”

各级政府现在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人员，都像陈永富一样尴尬，做的都是非本职能范围内的工作。

记者采访中发现，各市县虽然都成立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但具体负责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机构五花八门：如东方是爱卫办，昌江是文明办，临高是市政园林局，儋州是环卫局，陵水是美丽办。而在更基层的各个乡镇，抓此项工作的人员身份也是多种多样，白沙邦溪镇是武装部长，昌江七叉镇是分管文教委的党委员，临高东英镇是宣传委员，儋州王五镇是副镇长。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各级政府在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人员都是“不务正业”。

陈永富说，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要建立长效机制，理顺体制机制是当务之急，确定专门职能机构，划分工作职责，全省形成

上下畅通的工作机制。随着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深入，全省将建起近万人的工作队伍，必须尽快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我省利用经济特区的立法优势，进行顶层设计，先后出台《海南省城乡容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南省城乡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日常督查细则》等一系列的文件，各市县也根据实际相应制定镇村保洁员管理制度、招聘办法和考核细则等规章制度，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还推出义务督察员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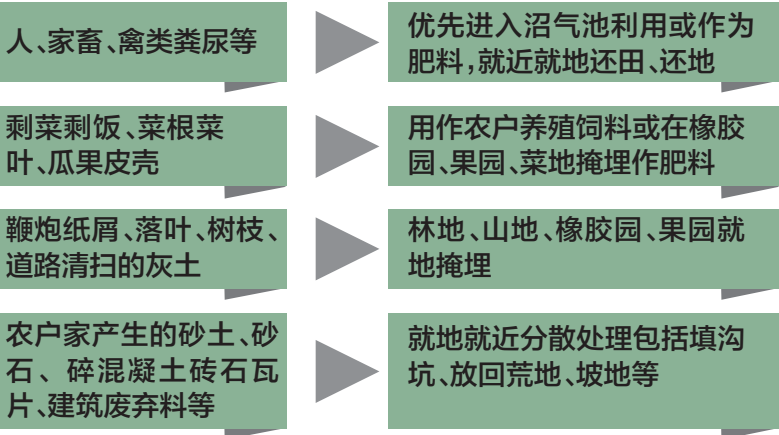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政策法规很难落到实处。《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农村与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事业所需经费一并列入财政预算。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有些市县今年农村垃圾整治投入数千万元，但是，资金来源不是常态化的财政预算，而是经过领导批示，从预备资金或其他渠道临时筹集。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说，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是一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必须成为各级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像城市环卫工作一样进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本报海口6月5日讯)

可就地处理美农村生活垃圾



制图/王凤龙